

從今天開始下田野

李昕升 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講師/博士後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參加與華南學派相關的研修班。如我曾在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 日廣州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之泛珠三角研究工作基地、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的第二十八屆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期間赤裸裸的接受劉志偉、黃國信、溫春來等眾多學術大家的批評，才真正體驗了華南學派帶有火藥味的求真務實的學風，無論是在研究理路上，還是在研究風氣上，讓我如沐春風、受益無窮，體驗了一次“壯遊”，最後回到了出發地已經是一個煥然一新的我。美中不足，並無田野環節。

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據說可能是絕唱，那我更是深深慶倖自己有幸參加，這第二次“壯遊”，在武漢營十餘天的時間內，我不僅收穫了友情（尤其是第六小組的小夥伴們，成為了我新的身份標籤，新的學術共同體已經誕生），更通過近距離觀察李孝悌、王鴻泰、鄭振滿等學術大師身體力行，深深體會到了走向田野的不易和價值，我已經不是“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局外人，而是把自己作為華南學派的一份子，在空間中發現時間，最終，本人業已成為“麵粉教”的忠實擁躉，立志——從今天開始下田野，把“湖北經驗”帶入我的出發地。

我是學農業史的，農業，自然要紮根田間，很遺憾此前我並沒有把腳步移動到田間，做的是“書齋史學”，有悖於我們南京農業大學的田野傳統，曹樹基、吳滔、楊國安等前輩老師給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本人近著《中國南瓜史》（北京：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在付梓之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並獲封“南瓜博士”頭銜，初識本人，獲悉的往往會調侃一下，但是學術對話不繼，讓我頗為遺憾，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南瓜史》是結構-功能的書寫方式，而非事件-過程的分析方法。所以現在正是我的學術轉型期，適逢本屆荊楚文化-武漢營，雪中送炭。

當然，更為關鍵原因，“書齋史學”固然是治史的基礎，然而缺乏的是對地方社會的直觀體驗（在地性），沒有回到具體的歷史場景，紙上談兵，最終我們書寫的只是“技術體驗”而非“生命體驗”，文字也必然缺少溫度。此外，現在歷史研究的主體從“國家”轉向了“人”，研究鄉土中國，如果不把眼光朝下追尋民間文獻（碑刻、族譜、契約文書等），僅利用官方文獻的話，必然會有諸多的局限和不足。官方文獻關照不到的地方，就需要民間文獻補其不足，我們看見官方

文獻也可能僅是“書面的歷史”而非“真實的歷史”，這就是地方文人對於“史權”的操控，自身話語對於史實的建構已經不是新鮮事了，於是我們更需要民間文獻，史料互證，以確定官方某些記載不是簡單的陳陳相因的完成任務或具有自我有意識的形塑一些符合地方利益的主觀訴求，更不要提本身治史也需要收集盡可能多的史料，“一網打盡”解讀越來越多的民間文獻，才能自圓其說，進而將文本背後的邏輯體系了然於心。

總之，如果我研究農史如果沒有“移情”到當時的歷史現場、進行現場重構，沒有充分考索民間文獻，就難以洞悉歷史事實，看到的也就只能是支離破碎的農業史資訊，而不能從整體上把握農業史的發展脈絡。退一步，即使我們就農業而談農業，民間文獻也可以給我們提供足夠的支援，如碑刻中的護林碑，就可折射古人封山育林的環保思想和地方社會與王朝國家的資源角力，等等，不一而足，對於我們研究今之顯學環境史大有裨益，事實上，又何止護林碑呢？

拉拉雜雜談了一些，我相信因果律，這次體驗，將會帶給我不一樣的學術空間，即使將來我的學術興趣發生轉向，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和實踐也將作為一條暗線與我的學術生命交相輝映！

最後感謝李孝悌老師、王鴻泰老師、余西雲老師等主辦方的辛勤付出，謝謝你們。對於眾多小夥伴，我相信我將來一定有機會說出這句話“那年，我們在武漢大學見過”。不說了，我要下田野了。